

认知心理学视域下的 英语翻译研究

王磊◎著

认知心理学视域下的英语翻译研究

王 磊 著



九州出版社
JIUZHOU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认知心理学视域下的英语翻译研究 / 王磊著. —北京 : 九州出版社, 2017. 6

ISBN 978-7-5108-5617-4

I. ①认… II. ①王… III. ①英语-翻译-研究
IV. ①H315.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166829 号

认知心理学视域下的英语翻译研究

作 者 王 磊 著
出版发行 九州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阜外大街甲 35 号(100037)
发行电话 (010)68992190/3/5/6
网 址 www.jiuzhoupress.com
电子信箱 jiuzhou@jiuzhoupress.com
印 刷 北京厚诚则铭印刷科技有限公司
开 本 787 毫米×1092 毫米 16 开
印 张 7.5
字 数 120 千字
版 次 2017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7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08-5617-4
定 价 38.00 元

★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

在人类发展的历史长河中，人与人之间的沟通交流、业务往来，经济文化的发展，社会科技的进步等方面，翻译都起着不可代替的重要作用。因此，翻译是人类思维与文化交流的重要工具之一。良好的翻译，不仅需要扎实的理论知识，还需要实战经验。翻译不是一种单纯的语言活动，它是一种语言认知心理活动。认知心理学是心理学与其他学科交叉渗透发展的产物，它主要负责探索人类行为基础的心理活动，展示人在信息输入与输出之间内在规律的心理分支。因为翻译活动是由人来实施的，且受大脑思维活动或心理活动的控制，所以翻译是一个相当复杂的心理活动。在认知心理学视域下的英语翻译中，翻译过程是对英语符码进行解码、从中提取意义、并对所提取的意义用汉语语符重新编码整合的一种信息加工活动。

首先，在研究认知英语翻译心理学的思想上，应该建立了一个非常明确的研究方向：本书建设了一系列认知心理学与英语翻译之间的理论转换，使英语翻译立足于认知心理学学科基础上渗透发展。在认知心理学指导下，英语翻译工作者应该拥有良好的翻译心态及翻译知识，由于翻译与语言有关，因此在分析和探究英语翻译过程中，必须将英语翻译视为一门精准的学科，集中研究语言之间的差异与语言形式之间的转换，从而归纳出英语翻译的一般规律，并结合两国之间的文化差异、译文翻译的用途等因素，适时调整语言之间的表述方式，这样就要求翻译工作者必须具有较高的文化素养及心理素质，在英语翻译过程中构建一个符合本国需求的译文。正是基于此，笔者结合自身的理论研究成果以及教学实践经验而撰写本书。

与已有的同类研究成果相比，本书主要具有以下两大特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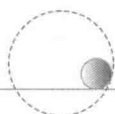
第一，科学性。翻译具有科学性，需要科学的理论指导，需要与相关学科知识整合归纳，尤其是要与认知心理学学科交叉渗透，从心理学视角分析翻译

的模式，这样既能经得起时间的考验，又能符合本国语言的表述方式，同时还具有较强的逻辑性和专业性。本书深入探究了认知心理学与英语翻译的学科交叉性，将认知心理学五个层面分别与英语翻译整合研究，具有较高的科学性。

第二，学术性。认知心理学本身就是一门新兴的学科门类，有极高的学术研究价值，将英语翻译与认知心理学相结合，从认知翻译层面研究英语翻译，使英语翻译不仅可以借鉴认知心理学学科的理论知识，也可以借鉴其模式方法，尤其是思维方式，并综合认知心理学各方面的内容，优化英语翻译理论。本书即采用了上述的方式，在一定程度上扩充了英语翻译理论的学术性。

需要说明的是，认知心理学视域下英语翻译研究并不止于本书的内容，尤其是其中的某些心理学与英语翻译渗透结合产生的模式方法，还需要读者结合自身实际，灵活运用，唯有如此，才能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本书在撰写过程中得到了相关领导的支持和鼓励，同时参考和借鉴了有关专家、学者的研究成果，在此表示诚挚的感谢！由于时间及能力有限，书中难免存在疏漏与不妥之处，欢迎广大读者给予批评指正！



第一章 翻译的基础知识.....	1
第一节 翻译概述.....	1
第二节 中西方翻译简史.....	3
第三节 翻译者的必备素质	20
第二章 英语翻译心理学研究	23
第一节 翻译心理学的过程	23
第二节 翻译心理学的理论基础	28
第三节 翻译心理学的学科系统	40
第三章 英语翻译认知心理学基础	44
第一节 认知心理学概述	44
第二节 认知心理学的起源与发展	52
第三节 翻译认知心理学研究方法	61
第四章 信息加工与英语翻译研究	71
第一节 信息与语言	71
第二节 英语翻译信息加工系统	80
第三节 基于信息加工理论的翻译过程模式	87
第四节 英语翻译中信息加工的问题解决	89
第五章 记忆系统与英语翻译研究	94
第一节 记忆系统的重要性	94
第二节 记忆系统的认知机制	95
第三节 记忆系统与英语翻译的过程.....	105
参考文献.....	112

第一章 翻译的基础知识

翻译（口译和笔译）作为一种跨语言—文化的传播手段，历史非常悠久。但长期以来，不论在中国或在外国，翻译理论却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译坛命题相当有限，专著寥若晨星，不能不引起人们深思。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翻译界本身的自我认识严重不足，翻译界在研究观念上、认识上也存在问题。纵观中外译界，为数不少的有志者正在努力研究翻译，努力创建不同的翻译理论模式。

要建设翻译学，首先要提高对翻译理论职能的认识，在观念上、整体的认识论上有一个基本的改变，才能在研究上有所作为，在研究水平上有所突破，建设起科学的翻译理论体系。

第一节 翻译概述

一、翻译的定义

翻译是思想交流的桥梁（使不懂原语的人，能通过译文而懂得体现在原文信息中作者的思想、意图、观点和所表达的思想感情）和接力（使原文信息能传播得更远，能传播到更多的人那里）。根据翻译在人类交流思想过程中所起的作用，可以将翻译定义如下：

翻译是人类交流思想过程中沟通不同语言的桥梁，使通晓不同语言的人能通过原文的重新表达而进行思想交流。翻译是把一种语言（即原语）的信息用另一种语言（即译语）表达出来，使译文读者能得到原文作者所表达的思想，得到与原文读者大致相同的感受。

这里所谓“感受”是指信息接收人看了或听了信息后在自己头脑中的反应，包括对信息概念的认识、理解，以及通过信息的思想感情所受到的感染、

影响等。

二、翻译的标准

现代人已经把翻译的标准概括为言简意赅的四个字：忠实、通顺。两百年前英国的泰特勒曾提出过翻译的三项原则：其一是应把原作的意义全部转移到译文上来，其二是译文必须具备原作的风格和文体，其三是译文应当与原作同样地流畅自如。

美国的翻译家奈达（Eugene A Nida）主张把翻译的重点放在译文读者的反应上，即把译文读者对译文的反应和原文读者对原文的反应作比较。他认为，翻译的实质就是再现信息。根据奈达的理论，翻译的“绝对一致”是不可能的，那只是一种理想而已。

林语堂先生也认为翻译的绝对忠实是不可能的，他认为：“译者所能谋达到之忠实，即比较忠实之谓，非绝对忠实之谓。一百分的忠实只是一种梦想。翻译能达到七八成或八九成忠实，已为人事上之极端。”总而言之，翻译的标准只能是相对的，而不是绝对的。当然，我们应该力求达到理想的最高标准。

三、翻译的过程

翻译绝不是简单地把一种文字直接转换为另一种文字的活动，它需要经过一个复杂而又曲折的过程。

钱钟书先生对翻译工作发表看法说：从一种文字出发，积寸累尺地逾越那许多距离，安稳到达另一种文字里，这是艰辛的历程。一路上颠顿风尘，遭遇风险，不免有所遗失或受些损伤。翻译过程的具体划分，一般都是理解、表达和校对三个阶段。奈达把翻译过程分为分析（analysis）、转换（transfer）和重新组织（restructuring）三个步骤。中国许多翻译工作者则把这种活动描述成“钻进去”然后再“跳出来”的过程。关于具体的翻译过程，可以分为以下几个步骤进行：

1. 首先反复研读原文内容，弄清原文题材、文体、作者写作态度和作品主旨，并借助词典，弄清楚那些不太熟悉的专有名词的翻译方式等。不可一拿到原文便着手下笔翻译，不研读原文便下笔翻译必定会产生以偏概全、译文不自然、欠通顺、前后不统一等错误。

2. 根据原文作者思想，以英汉两种语言的句子为理解和翻译单位，揣摩译文中将要采用的句型，选定译文与原文句子类型相近的句子框架。而后将句子中除去主语、谓语和宾语之外的其他语言信息，依据其功能，分别转译为说

明主语、谓语和宾语的目的语,使译文句子初步完美。

3. 运用翻译过程中常用的增删词汇、转换成分等技巧和手段,完善译文句子。润色和校改译文,使译文的各种用词风格前后贯通一致,并使其与原文的韵味基本相符。

第二节 中西方翻译简史

一、西方翻译史的几个重要阶段

在西方翻译史上,圣经翻译之前的翻译活动处在摸索阶段,严格而言,还谈不上有什么理论认识,至多也仅是对翻译的一些朦胧感知而已。从公元前250年左右《七十子希腊文本》的翻译活动开始,一直持续到16世纪的圣经翻译,这段时期人们把它命名为宗教典籍翻译阶段,这一阶段对翻译的探讨确立了人类关于翻译的基本理念,包括最基本的翻译方法论,如直译、意译、可译、不可译等问题。随着民族语言与民族文学的确立,尤其是西方文艺复兴运动兴起之后,文学翻译开始成为翻译的主流,从而开启了以文学名著、社科经典为主要翻译对象的文学翻译阶段。在这一阶段,对翻译的理论探讨更加丰富和深入,并且产生了针对各种文类、体裁作品的翻译理论。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实用性质的非文学翻译(即实用文献的翻译)占据了翻译生产的主流,翻译发展为一个专门的职业,翻译理论意识空前高涨,翻译学科得到快速成长,由此开始了人类翻译发展史的第三阶段——实用文献翻译阶段。当然,对西方翻译发展史的这种三阶段划分,依据的是每一阶段的主流翻译对象,但它们之间是相互交叉的,而并不是说一个阶段只有一种翻译对象。同理,对翻译的观念也是相互交叉的,即使在目前的实用文献翻译阶段,文学翻译或宗教翻译阶段所形成的译学理念和理论仍然在发挥作用和影响,只是说明与实用文献的翻译相比,它们在整个翻译活动和翻译产业中所占的比例比从前要小,正在边缘化,其影响也正在日渐缩小。

(一) 宗教典籍(《圣经》)翻译阶段

两方的宗教典籍翻译阶段的主要翻译对象就是《圣经》,包括讲述历史、预言、诗歌和神学的66部书,历时1600年的创作,至少由40位不同的作者写成。《圣经·旧约》包含39部书,大约写于公元前1500年至公元前400年。

除了一小部分以外，主要用希伯来文写成。《新约》包含 27 本书，大约在公元 40 年至 90 年间写成。圣经翻译历时 2200 多年，经历了几个里程碑式的阶段：首先是公元前的《七十子希腊文本》，其次是公元 4 世纪到 5 世纪的《通俗拉丁文本圣经》，之后是中世纪初期各民族语的古文本（如古德语译本、古法语译本）、16 世纪宗教改革运动以来的近代文本（如德国的路德本、西班牙的卡西欧多罗本、英国的钦定本、俄罗斯的尼康本），以及各式各样的现代文本（如英语的《美国标准本圣经》《新英语圣经》和《今日英语文本》等）。

《七十子希腊文本》是对犹太《圣经》希腊文翻译的称呼。该译本起源于埃及的亚历山大大帝，大约是在公元前 285 年至公元前 249 年间翻译完成的。它在希腊的犹太人中被广泛使用，因为遍及整个帝国的犹太人逐渐开始忘记他们的希伯来语言，而把希伯来文翻译成希腊文，让许多非犹太人也有机会去了解犹太教。《七十子希腊文本》一直被奉为经典译本，成了“第二原本”。直到今天，东正教会对《圣经·旧约》的教导仍然依靠希腊文译本。一些现代圣经翻译也用希腊文译本跟希伯来文原稿一起作为翻译的源本。古拉丁语、斯拉夫语和阿拉伯语等语言中的许多《圣经》译文则不以希伯来原文而以希腊语译文为源本。

在较早时期就有人将《圣经》译成拉丁语，到公元 4 世纪这一翻译活动达到了高潮，其结果就是出现了各式各样的译本。哲罗姆（St. Jerome）于公元 382 年至 405 年翻译的《通俗拉丁文本圣经》成为钦定本，标志着圣经翻译取得了与世俗文学翻译分庭抗礼的重要地位，在以后的较长时间里超过了世俗文学的翻译，成为西方翻译的主流。由于发现希伯来文与希腊文译本之间存在着若干歧义，公元 382 年，哲罗姆应教皇达马苏一世（Pope Damasus I）之请将《圣经》译成拉丁文。他历时 23 年，将已有的旧拉丁文版本比对希伯来文《圣经》，经过翻译整理之后，最终完成了《通俗拉丁文本圣经》（*Vulgate*）。《通俗拉丁文本圣经》到了 16 世纪时的“特兰托会议”（Council of Trent, 1546）才正式成为官方版本。这个译本很成功，成为罗马天主教会所承认的唯一文本，也成为后来阿尔弗烈德国王（King Alfred）所参考的版本。

从罗马帝国时代到中世纪初期，教会在文化、教育、哲学、文艺以至整个精神领域里，占有绝对的统治地位，因此，《圣经》和其他宗教作品的诠释和翻译得到了进一步加强。他们为了传教，开始用德语口头翻译宗教文献，公元 800 年前后出现了第一部德译本《圣经》，该译本也被称为德语最早的文字。

中世纪末期，随着欧洲各民族国家的建立，民族地域逐渐划定，民族要求日趋强烈，民族语言也相继形成。因此，用民族语言从事较大规模的翻译到中世纪末期开始出现，有的译本甚至成为该民族语言的第一批文学材料。宗教改

改革家马丁·路德 (Martin Luther, 1483-1546) 顺从民众的意愿, 采用民众的语言, 于 1522 至 1534 年翻译刊行第一部“民众的圣经”, 使任何识字的人都可能亲自学习《圣经》, 而不依赖教会及其教士, 开创了现代德语发展的新纪元。1611 年《钦定本圣经》的翻译出版则标志着英国翻译史上又一次大发展。之所以称它为“钦定”, 是指这个译本得到英国国王詹姆士一世 (James I) 的指令, 由 47 名学者于 1607 年开始翻译, 用它代替以前所用的英译本, 用于礼拜时的诵读。《钦定本圣经》文体优美, 朗读时铿锵有声, 颇有“韵味”, 具有较强的文学性。随着文艺复兴运动的兴起, 民族主义在政治上抬头, 教会的力量相对减弱, 圣经翻译的热情慢慢消退。尽管如此, 《圣经》在今天仍然是世界上翻译语种最多的书籍, 始终吸引着翻译家与学者们的兴趣。

圣经翻译家对翻译的认识, 大多是对自身翻译经验的总结, 对翻译方法的总结, 从字对字的直译, 到随意性极大的意译, 再由较成熟的直译到较成熟的意译, 并最终实现直译与意译的调和, 最初以词为翻译单位逐渐依次转变为以句子、话语为翻译单位。圣经翻译最初坚持直译的主要原因还是“宗教经典神圣不可侵犯”。斐洛 (Philo Judeus, 20B. C. -50A. D.) 认为, 圣经翻译是神圣的, 译者单凭精通两种语言而无“上帝的感召”, 是不能从事翻译的。为了避免在翻译中的主观随意, 译者就只好在词序和措辞等方面采取死译, 译者的任务是做到字字对译, 丝毫不必顾及译语中的特殊形式和习惯。这种字对字的直译, 其译文很难为普通大众所理解。但随着译者语言水平的提高和翻译经验的积累, 译者跳出了逐字对译的藩篱, 而注重意义的整体传达, 并不绝对排除意译的方法。哲罗姆认识到译者的选词造句不是靠“上帝的感召”, 而是靠译者本人的“博识和对语言的精通”来实现的, 而且各种语言在用词风格、表达习惯、句法及语义、内容等方面都互为区别, 因而翻译中只能采用意译的方法。后来《圣经》的解释权收归到少数神甫手中, “翻译必须依靠上帝感召”的认识再次抬头, 强调只有受了“上帝的感召”的人才有资格翻译《圣经》。但是, 随着民族国家的逐步形成, 各民族自我意识的进一步加强, 民族语言的地位得到了提高, 圣经翻译也转而以各民族语为主。在翻译《圣经》的过程中, 只要不违背原意, 则不必拘泥于原文形式, 因为翻译的目的是为了满足普通大众的需求, 并不是为少数研究者而译。圣经翻译重在正确传达意义, 让读者理解。

(二) 文学翻译阶段

1. 西方早期的文学翻译

西方早期的文学翻译, 是使用本民族语言进行文学创作的“副产品”, 同

民族语言的形成与民族文学自身的发展密切相关。在翻译理论方面，主要是围绕直译与意译的讨论，以及如何使用民族语言来摆脱拉丁语的影响。

本民族语言的成熟与民族文学的发展，是文学翻译存在的前提。到了16世纪文艺复兴时期，法国文学翻译依然只是创作之余的“副产品”，翻译质量不高，影响也不大。贡献最为突出的是雅克·阿米欧（Jacques Amyot，1513-1593），他先后用了17年时间（1542-1559）译出了普鲁塔克（Lucius Mestrius Plutarch）的《希腊罗马名人比较列传》（简称《名人传》，*Lives of Noble Grecians and Romans*）。阿米欧采用了创造性意译，从而把原作变成了他自己的《名人传》。他的译本获得了成功，给同时代和后来的法国以及西欧其他国家的作家提供了创作素材。阿米欧的翻译强调兼顾内容与形式，遵循直译与意译的统一，把大众的语言与学者的语言熔于一炉，并创造了大量新词，极大地丰富了法语的词汇。

文艺复兴在英国是以重新发现希腊、罗马的古典文化开始的。大学里恢复了古希腊语的教学，接着出现了规模宏大的翻译活动，众多的学者、作家将古代希腊、罗马和近代意、法等国的学术和文学名著译成了早期近代英语。整个伊丽莎白一世时期英国最著名的译作就是托马斯·诺斯爵士（Sir Thomas North，1535-1604）1579年从阿米欧的法语版转译而成的《名人传》。诺斯的翻译不同于法语的风格，如用词的改动，精神实质的修改，均是在原作基础上的一种创作。诺思译笔优雅地道，人们常把他的译本误认为原作，他的译作也为莎士比亚创作罗马悲剧提供了素材。1603年，佛罗里欧（John Florio，1553-1625）把欧洲散文的创始者、法国思想家蒙田（Michel de Montaigne）的《随笔集》翻译为英语，成为英语文学翻译中的经典。

2. 启蒙时期的文学翻译

启蒙运动是17世纪至18世纪继文艺复兴之后欧洲发生的又一次思想解放运动。以城市“中产阶级”为主的文学作品的读者群体逐渐形成，再加上杂志的推波助澜以及出版翻译作品所带来的经济利益，这些都使得文学翻译迅速繁荣起来。

17世纪英国最伟大的翻译家是约翰·德莱顿（John Dryden，1631-1700），翻译过普鲁塔克的《希腊罗马名人比较列传》以及薄伽丘、奥维德、贺拉斯、荷马等人的作品。他的翻译风格因所译作品风格的改变而改变，文字平易流畅。在翻译理论方面，他写过大量的论文和序言，阐述自己的观点，明确而系统地提出了翻译的原则。德莱顿的翻译原则与观点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 (1) 翻译是艺术；
- (2) 翻译必须掌握原作特征；
- (3) 翻译必须考虑读者；
- (4) 译者必须绝对服从原作的意旨；
- (5) 翻译可以借用外来词；
- (6) 翻译分

为三类：词译（或逐词译，*metaphrase*）、释译（*paraphrase*）、拟译（*imitation*）。他主张采取折中的方式，即介于过分随便与过分呆板之间的释译。^①

英国 18 世纪的翻译家亚历山大·蒲柏（Alexander Pope, 1688-1744）翻译了《伊利亚特》（6 卷）和《奥德赛》（5 卷）。与他的创作一样，其翻译采取的是英国读者熟悉的双韵史诗体，译文用词隽永，风格清雅，在相当长的时间里被读者奉为标准英译本。为了满足当代读者的需求，他大量使用了 18 世纪英诗创作中惯用的词汇，因此在某种程度上蒲柏的译作变成了他本人的创作。在译作的序言中蒲柏指出，好的翻译，采取直译肯定行不通，用草率的拟译法来取代直译以弥补它的缺陷，也同样是一大错误。译者必须在最大程度上忠实原作，而不应当企图超过原作者。

法国 18 世纪的启蒙运动文学家多数以思想家的身份出现，文学作品只是表达思想的一种辅助手段。尽管法国启蒙思想家依照古典艺术法则对莎士比亚的评价并不高，但莎士比亚作品的译介依然是 18 世纪法国文学翻译最主要的内容。初期的翻译家翻译莎士比亚的戏剧时，为了使译文符合法国的高雅文体，不惜删改原作。真正认识到莎士比亚独特写作风格的翻译家是勒图尔诺（Pierre le Tourneur, 1736-1788），他翻译了《莎士比亚全集》，其风格为后来莎士比亚作品的翻译树立了榜样。他强调忠实原作，要完整地保留原作的精神实质，不赞成删改原文以迎合法国人崇尚典雅的口味，而主张保留原作生动的形象和通俗的语言风格。

德国的启蒙运动是在先进的英国和法国的影响下兴起的。德国“巴洛克诗歌之父”奥皮茨（Martin Opitz, 1597-1639）翻译引进了古希腊、罗马的颂歌体以及意大利、法国的十四行诗。17 世纪，西欧的长篇小说特别是西班牙的骑士冒险小说和英国的田园牧歌小说被译介到了德国，成了德国文坛模仿的对象。

3. 浪漫主义时期的文学翻译

浪漫主义时期的翻译家和翻译理论家，大多是当时的著名作家，所以该时期的翻译理论无不受到浪漫主义文学思想的影响。这一时期翻译的重心从古代作品转移到近代或当代作品，与此同时，文学翻译的基本问题也都得到了深入的探讨，且表现出系统性、理论性的特点。英国翻译理论家亚历山大·弗雷泽·泰特勒（Alexander Fraser Tytler, 1747-1814）于 1792 年出版的《论翻译的原则》代表了这一时期翻译理论的最高成就。泰特勒认为“出色的翻译”应

^① 谭载喜. 西方翻译简史（增订本）[M].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

该是将原文的优点完整无缺地以另一种语言表达出来，使译文读者对译文理解得如原文读者般清楚透彻，感受也像原文读者一样深切强烈。在此基础上他提出了著名的“翻译三原则”，即：（1）译者应精通原作语言和题材，完全再现原作的思想；（2）译者应准确判断和鉴赏原作的风格，并想象原作者如果用译语创作该如何表现自己，使译作的风格和手法与原作等同；（3）译作应与原作同样通顺。

德国浪漫主义时期的著名作家几乎个个都是翻译的好手，他们翻译了大量古希腊、罗马和近代以来英、法、西等国的作品。这些作家兼翻译家在理论上亦多有阐发，从文学及语言学的角度，对翻译进行了多层次的探讨，使德国成为欧洲翻译理论研究的中心。

歌德（Johann Wolfgang Von Goethe, 1749-1832）认为，翻译不是完美的，但仍是最重要、最有价值的活动之一，译者是“人民的先知”。他甚至认为译者“铸造了一种完全适合于交流两国思想的语言”，其潜台词是翻译对译入国语言的形成和发展有相当的影响^①。不同语言表达意思具有共性，文学是可译的。最恰当的翻译是朴实无华的翻译，译诗的最好方法是采用散文体。他把翻译分为三类：传递知识的翻译（informative translation）、按照译语文化规范的改编性翻译（adaptation）、逐行对照翻译（interlinear translation）。歌德最为推崇第三种翻译，认为这样的翻译使原文与译文共生、译语和源语融合为一，产生了新的形式，而又没有抛弃各自原有的成分。

荷尔德林（Friedrich Hoelderlin, 1770-1843）认为人类每一种具体语言都是同一基本语言（纯语言）的体现，翻译就是寻找构成这一基本语言的核心成分即意思。荷尔德林把对语言的理解和复述过程当成对直觉进行考古研究的过程。他主张采取逐字对译，在源语和目标语之间开辟一个中间地带，探寻人类语言所共有的东西。

以德国为代表的西方译界在当时多主张异化翻译。翻译家和作家认识到其他语言并不比自己的母语低下，也正是这种语言观念的转变，使得翻译家开始采取平等的态度对待原文。翻译开始容忍文化的差异，翻译只能试探性地接近原文，鼓励向原文靠近。

4. 现代主义时期的文学翻译

英国文学评论家康诺利（Cyril Connolly）在1965年出版了《现代主义运动——1880至1950年英、法、美现代主义代表作一百种》，其标题指明了现代主义的上限和下限。英国、法国、德国等国先后进入了帝国主义时期，各国

^① 爱克曼·歌德谈话录 [M]. 朱光潜译.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

坚持强硬的民族主义路线，对本民族文化的自豪感增强，不再把翻译看作是丰富民族文化的主要手段，并进而贬低翻译的作用。西方各国除了相互翻译各国的现当代文学作品外，还把目光投向了殖民地国家和东方各国的文学经典作品。在翻译理论方面，受现代主义文学思想的影响，对传统的翻译理论也提出了深刻的反省，特别是对语言的普遍性提出了质疑，原作的意义变得隐晦难解，译者必须根据自己的体验去填补文本的空白。所以，这一时期的翻译理论，更加注重翻译的创造性，更加关注翻译中的语言问题，虽没有脱离译文选词造句等翻译技巧的论述，但为翻译研究的语言学转向奠定了基础，为把翻译文学看作独立的存在提供了理论思考。

英国作家爱德华·菲茨杰拉德 (Edward Fitzgerald, 1809-1883) 翻译波斯诗人莪默·伽亚谟 (Omar Khayyam) 的《鲁拜集》时，认为原作“够不上诗的水准，难以叫人不对它们恣意改写，而且它们也确实缺乏一点艺术来塑造自身。”译者所要做的是如何把粗糙得像黏土一样的原作塑造成受人欢迎的作品，提升原作的档次。这时期的译者对殖民地国家的作品随意改写，却不敢对荷马、维吉尔等人的作品肆意妄为。这种典型的民族主义翻译观遭到后殖民翻译学者的揭露与抵制，翻译在殖民化过程中扮演了不太光彩的角色。

波斯盖特 (J. P. Postgate, 1853-1926) 是英国著名的文学家、翻译家、翻译理论家。在《译论与译作》中，他提出了前瞻式翻译 (prospective translation) 和回顾式翻译 (retrospective translation)。前瞻式翻译是指译者心中始终装着读者，采用自由的方法，使用常见的表达形式，以保证读者原有的思想不受冲击及其预测不受干扰，翻译的目的是要表现译者精通译文语言，重点在于译文而不在原文。回顾式翻译是指译者总是着眼于原作者，因为翻译的目的是传授原文知识，而不是向前观看，考虑译作的读者。

法国文学的优良传统是善于通过翻译吸收外来文化。19世纪下半叶，法国将异军突起的俄国小说大量译介为法语。在翻译理论方面，马鲁佐 (J. Marouzeau, 1878-1964) 的《论拉丁语的翻译》是法语中一篇重要的翻译理论文献。他认为翻译是一门技巧，译者应向读者揭示原作的内容，而不是它的外壳，要使用活的语言，假设原作者现在还活着，他会用什么方式来表达同一事物。

在翻译理论方面，德国影响最大的是著名思想家瓦尔特·本雅明 (Walter Benjamin, 1892-1940)。他于1914年开始翻译波德莱尔 (Charles Baudelaire) 的诗，并在之后翻译出版了波德莱尔的诗集《巴黎风光》。本雅明在该书的译序“译者的任务”中并没有直接论及波德莱尔或他的这部诗集，而是对原作和翻译同“纯语言”的关系的思考。对本雅明而言，译者的任务就是弥合语

言的碎片，回归到语言堕落之前的整体和谐状态。平庸译者对原作意义的关注远远多于对其文学性和语言风格的关注，他们只知译作的存在是为了服务于原作，只能译出原作中非本质的内容^①。本雅明指出，译作虽以原作为依据，但却是原作的来世，是原作生命的延续，译作不必追求与原作意义相仿。译者的任务就是要用自己的语言去释放被另一种语言的咒符困住的纯语言，就是要在对原作的再创造中解放那种被囚禁的语言。真正的译作是透明的，它不会掩盖原作，不会遮蔽原作的光芒，所以他主张双语隔行对照式样是一切翻译的范本。当代美国翻译理论家根茨勒（Edwin Gentzler）认为，英美解构主义者有关翻译问题的讨论，主要就是围绕着对本雅明的“译者的任务”一文的评论展开的。“译者的任务”也因此被誉为翻译理论的“圣经”，解构主义翻译理论的经典。

（三）实用文献（非文学）翻译阶段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出于实际需要，商业、外交、科技方面的翻译蓬勃兴起，其声势日渐超过文学翻译，成为西方现代翻译发展的一个主要内容。非文学翻译的繁荣体现在翻译从业者的职业化、翻译行业的产业化、翻译观念的现代化、翻译研究的学科化等方面。二战之后，各种国际组织成立，对职业翻译的需求激增。从纽伦堡大审判，到联合国的成立，欧洲经济共同体以及各种区域性组织、国际行业组织的成立等，都需要大量的职业翻译人员来保障各主体国家和地区能够以母语来阐明各自的立场。职业翻译还体现在国家层面的需求，一些多语言、多文化的国家用法律的形式规定了多种官方语言，从而保障了翻译职业的稳定需求。各类专门翻译院系的成立，翻译培训的专门化，保证了翻译从业者的职业素养。翻译职业的资质认证为翻译职业化提供了标准和壁垒。翻译发展为一种由千万人参与、内容涉及各个领域的专门职业。

实用文献翻译的繁荣，主要得益于以信息技术为核心的第三次科技革命，以及涵盖政治、经济、科技、劳动、文化、媒体、生态和社会认同等方面的全球化发展。经济的全球化带动了资本、商品、技术、劳动力在全球范围内日益频繁的流动，不同文化跨越民族范围的接触交流以及相互吸收融合，都为翻译创造了前所未有的巨大市场。国际贸易的增长、国际组织的壮大、各个国家之间文化交流的加深，以及软件产业所促成的本地化需求，使翻译变成了社会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并发展为一个独立的产业。

文学翻译已经只是当前所有实际翻译活动中很小的一部分，文学翻译的边

^① 谢天振. 当代国外翻译理论导读 [M]. 天津: 南开大学出版社, 2008.

缘化、非主流化是一个无可回避的事实，而科技、商业、娱乐、媒体等实用文献的翻译越来越成为当今翻译的主流。诸如要旨翻译、现场翻译、视译、配音、字幕翻译、唱词字幕翻译等，还有翻译版权问题、已有翻译的重复使用问题等，都是文学翻译所忽略的领域。翻译的社会维度，不仅涉及翻译规范，还包括其他传播与接受翻译的代理人与机构，如发送者、客户、校订者、其他译者、出版社、公司等，也都会在翻译产业化过程中面临新问题。对这些问题的关注，正在革新人们对翻译的既成印象。原文不再是讨论翻译问题的唯一准绳，人们认识到翻译已经把一文本变成了原文，而并没有影响源语文化中的该文本，因此，原文也就并非要好过译文，或比译文更权威。原文可由多个来源构成，翻译可重复使用以前的译文。工业产品和本地化手册同步上市，书籍、电影、国际新闻等全球同步出现，欧盟的正式文件有23种不同语言的版本，这些翻译现象甚至使得原文这个概念不复存在。因此，翻译的本质是“基于源语文化而在目的语中创作的文本”。对实用文献翻译的分析，从职业翻译语境出发进行翻译研究，必然使翻译的理论与实践建立起更加直接的联系。然而目前对非文学（实用文献）翻译的研究和理论思考却远远不够，人们的翻译观念大多仍然停留在宗教典籍翻译和文学翻译阶段，并总是试图以这两个阶段的翻译观念来看待甚至解释当今的翻译事实和翻译理论，从而产生了不少困惑乃至抵触，因此，译学观念的现代化势在必行。

西方翻译研究在20世纪下半叶出现了两次“质”的飞跃，一次是把语言学理论引入了翻译研究领域，出现了翻译研究的“语言学转向”，结构主义、交际理论、语言学理论等成为翻译理论的基础；另一次是把翻译研究置于文化语境、历史和传统等更为广阔的领域中展开，出现了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从而使翻译研究发展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20世纪下半叶以来的当代西方翻译理论实现了三个根本性的突破：（1）翻译研究开始从一般层面上的语言间的对等研究深入到了对翻译行为本身的深层探究；（2）翻译研究不再局限于翻译文本本身的研究，而是把目光投射到了译作的生产和消费过程；（3）翻译研究不再把翻译看成是语言转换间的孤立片段，而是把翻译放到一个宏大的文化语境中去审视。不难发现，当代西方翻译所处的文化语境、翻译的内涵以及翻译研究的内容都已经发生了变化。因此可以说，翻译研究的学科化，是翻译从业者职业化、翻译行业产业化、译学观念现代化的必然结果。

二、中国翻译史的几个重要阶段

起始于东汉时期的佛经翻译形成了中国翻译历史上第一个重要时期。在此后的一千多年的时间里，中国翻译史上又经历了一些重要的历史时期，翻译理